第二章
从天而降的礼物

你认为你能把日本变成一个民主国家吗？我不这样认为。 6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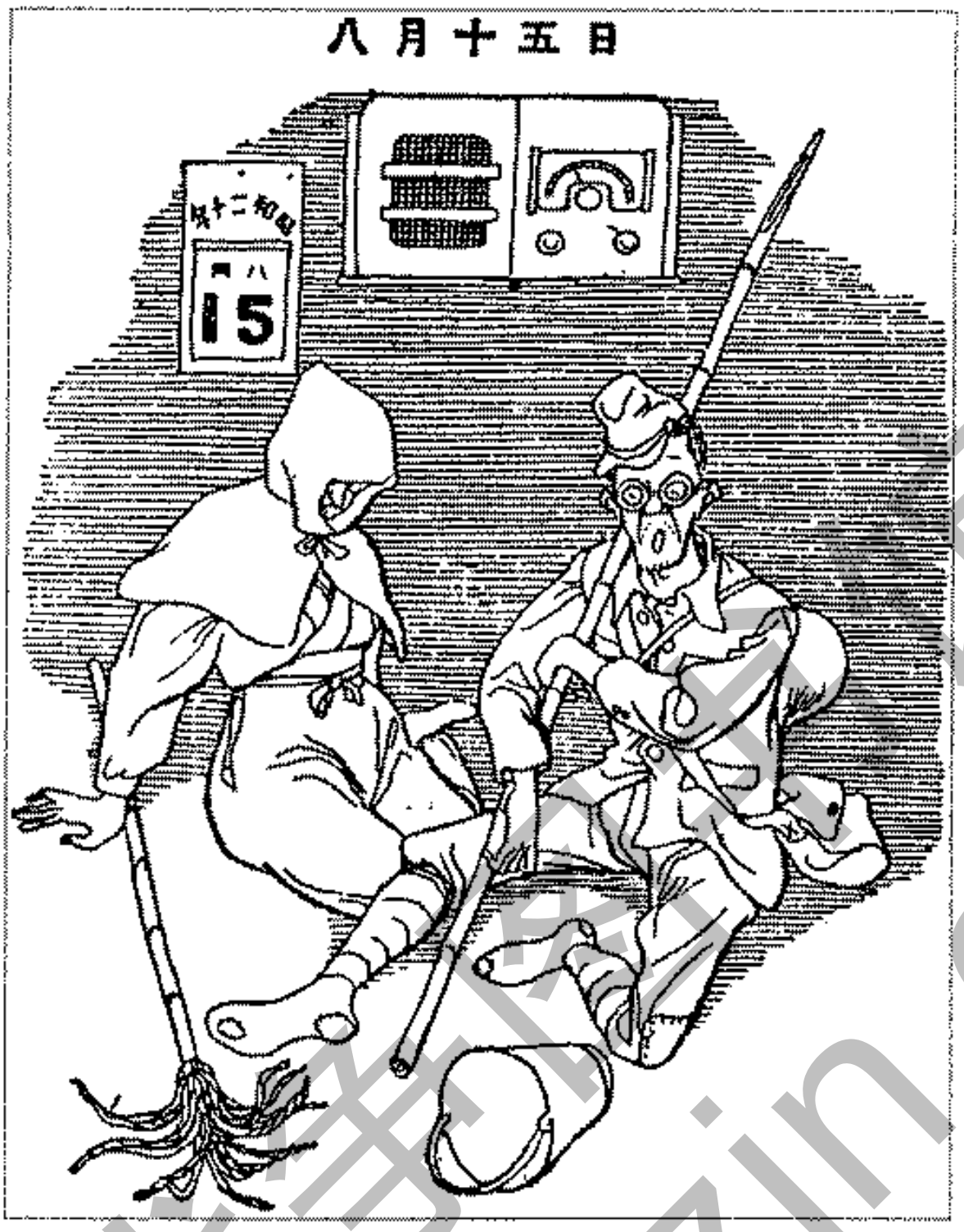
——吉田茂首相

我们可以试试。

——盟军总司令部民政局查尔斯·凯德斯（Charles Kades）上校[1]

1946年8月，颇有才气的漫画家加藤悦郎，为自己创作于美军占领第一年的插图集写了个序言。加藤坦言自己缺乏反对战争的勇气，其实他这不过是种自我掩饰的说法。事实上，他曾全身心地将自己的才华投入战争的宣传。1942年，是加藤创作了那幅令人毛骨悚然的战争招贴画：把罗斯福和丘吉尔（或者说是山姆大叔和约翰牛，因为这些个人和国家的称谓可以互换）描绘为下半身是野兽的家伙。一把亮闪闪的日本刺刀戳在他们的屁股上。画的标题是："彼奴等的死，就是世界和平的诞生日！"

加藤用复杂的比喻来说明这一暧昧的情形。他解释说，直到投降，他不是用手而是用穿了军靴的脚在画画。自无条件投降的瞬间开始，他的笔又重新回到了手上。也就是说，回到了它正常合理的位置，然而这实行起来却并非易事。加藤将这本小小的漫画集献给大家，当作过去一年他生命的记录。他选定的题目是《赠与的革命》。[2] 似乎在一夜之间，加藤所说的野蛮的敌人已经成为解放者，成了一场自上而下的革命



在投降一周年之际，漫画家加藤悦郎以这幅漫画传达出一种普遍的情绪：战争曾经是多么愚蠢。图中，1945 年 8 月 15 日，精疲力竭的男人和女人正在木然地收听天皇投降的玉音放送。他们在回想，用救火的水桶和竹竿做的长矛抵挡原子弹的威力是多么愚蠢。

的代理人。

加藤所起的题目，捕捉到了占领初期一种普遍的情绪。而且他将这种情绪在几张纸上精练地表达了出来。第一幅图画的是，1945 年 8 月 15 日，一对夫妇疲惫地瘫坐在地上。女人穿着战争年代常见的雪袴，头戴防空袭火灾的头巾。男人则身穿松松垮垮的军服，手里抓着一根竹矛。一只救火用的水桶扔在一边。他们身后是一架收音机，正在播送天皇的终战诏书。插图说明是，以竹竿做的长矛来对抗原子弹是多么愚蠢。人们还未感受到从战争到解放的欢乐，就被搞得晕头转向了。

67 第二幅画，这对夫妇正在取下战时灯火管制时遮住窗子的黑纸，并将后院的防空壕填平。他们先前确曾认为，那迟早是他们的坟墓。

在简单地描绘了真正将光明带回人们生活中的欣慰和喜悦之情后，加藤引入了他的中心主题：一群日本人向天空伸出双臂，天空中飘满了降落伞，伞下挂着的罐子上贴着“民主主义革命”的标签。插图的标题是“天降的赠物”，文字说明如下：

铺天盖地投下的燃烧弹和炸弹突然停止了。然后，从同一片天空，开始降下和平的礼物。这就是所谓的民主主义革命！不流血的革命！

然而，我们日本人，战败的日本人，被战争搞得精疲力竭的日本人，是如何得到这个礼物的？我们将如何接受它？

后面的漫画，讽刺而又充满希望地描绘了战败头一年的生动全景。加藤奚落摇摇欲坠的战后首任东久迩宫内阁：就像是一个店铺在打广告卖商品，却无货可卖。他嘲弄“不流血革命”不露痕迹的转变——军国主义者穿上“民主”的礼服，政客将战时的标语口号覆盖上“自由主义”，右翼的后台老板修剪了八字胡，为的是看上去好像现代工人领袖，学生们把希特勒的肖像换成了马克思，将《我的奋斗》换成了《资本论》。

政府和民间的精英们，在加藤所展现的新国家里确实表现很差。财政和经济政策，只不过是便于大资本家们在战败的混乱中兴风作浪。猛烈的通货膨胀，使社会陷入了焦虑与民主的危机。“划时代的”选举法，为 1946 年普选权后的第一次大选铺平了道路，但却成了潘多拉的魔盒（日本的说法是浦岛太郎的玉手箱），产生出了原保守派外交官吉田茂为首的反动内阁。在加藤的眼中，难以驾驭的左翼政治力量与这些破产性的政策以及政策的制定者们一样，都不是什么值得认真对待的选择。加藤的一幅漫画中，社会党人正在跟共产党人签署脱离关系的文件，背景中却有一位艺伎（象征传统的保守党）在假笑。

加藤也以饱蘸活力与困惑的画笔，表现日常生活的茫然与困境：街头的流浪儿抽着雪茄。工人们为经济停滞的原因鸡生蛋蛋生鸡地争吵不休。（“没有粮食，就没法挖煤。没有煤，就造不出肥料。没有肥料，就没有粮食。没有粮食，就没法挖煤……哇，头晕啦！”）全副武装的盗贼

在加藤生动的描绘中，占领军引入的改革议程是广受民众欢迎的"从天而降的礼物"：胜利者的降落伞受到欢天喜地的迎接，伞下挂的罐子上书"民主主义革命"。

破门而入，却发现没什么可偷。("唉，你可以把空柜子拿走。"被绑着的家庭主妇说。)黑市商人建议卖春妇们自己成立组织，而黑市本身的出现就是对政治经济大环境滑稽的戏仿。先前的军用钢盔被颠倒过来当作民主的煮锅叫卖。("快来买，快来买……便利货——一旦危机来临，你就可以马上再把它当钢盔用啦!")一位清瘦的知识分子模样的小贩在叫卖"空洞理论面包"(没有内容，但是却刺激胃口)。一位两手空空的推销员，正在为他将来可能拿出的任何玩意儿拉订单，而且要求预付定金。

在这一切的喧闹之中，胜利者的革命从天而降。在另一幅漫画中，美国，正如从天堂伸下的上帝之手，为日本带来了"自由之钥"作为礼物，解除了言论的约束和限制。就像从天而来的巨剪一挥，美国剪断了

绑在普通日本人民身上的铁链，并赐予他们公民的自由权利。战败前日本的经济，被庞大的金融和工业寡头垄断着。这些财阀剥削榨取人民，使人民不堪重负。麦克阿瑟的总部奋起神威，将千钧重负从被压榨的人民背上卸了下来。当日本的领导者还在呼呼大睡的时候，是美国人再一次从天上伸出上帝般的双手，为饥馁的日本人民送上宝贵的食粮。 69

“自上而下的革命”

加藤悦郎精通线条勾勒和透视画法，拥有一种独特但绝非怪异的日本风格。他对于征服者的刻画，看上去与美国国内十分相似。关注被占领国日本的美国漫画家们，通常将胜利者描绘成无所不能、像上帝一样的形象。事实上，他们经常描画同一幅“上帝之手”的图像：小日本被握在盟军的手掌中，或是接受麦克阿瑟将军从天而降的命令。更宽泛地说，在占领期及其后，战胜者和战败者都将美国为战败国制订的改革方案，看作是一种强加的“自上而下的民主革命”的尝试。麦克阿瑟将军本人很少放过机会，唤起大家对在他庇护下进行的政治、经济乃至“精神”变革的关注。[3]

这种自上而下的变革，在早期恰恰得到了德田球一的支持。德田是一位热情如火的共产党领导人，一直被监禁了 18 年。1945 年 10 月初，就在他迈出监狱大门前夕，当占领军的领导者“剪断了”政治束缚的“锁链”，德田立即写下了以如下宣言开篇的《告人民书》：“我们向在日本的盟国占领军表达最深刻的感激之情，他们致力于从法西斯主义和军国主义手中解放全世界，为日本的民主主义革命开辟了道路。”此后，当冷战升级，这番言论无疑成了令共产主义者感到尴尬的口实。他们只得勉强将德田的讲话进行合理化解释，强调德田所指的“盟国”至少是将苏联包括在内的。[4]

这种做法不过是马后炮式的修正主义。直到1947 年之前，无论是左派还是自由主义人士，通常都将势不可挡的美国占领军看作是解放军。在美国之鹰的卵翼下实现“民主变革”的观念流布甚广，这种说法几乎立即成了一种常见的套语。各式各样的标语口号，传达着在征服者的监护之下——事实上，是在他们的命令之下——实行政治和社会改革的理念。除了加藤经常提到的“赠与的革命”和民主的“赠物”之外，日

本人流行的说法还有“波茨坦革命”，暗指日本投降的条款，是由美国和其他盟国在 1945 年 7 月 26 日的《波茨坦宣言》中提出来的。类似的说法还有“自上而下的改革”。[5]

然而，这些说法并不总是传达出肯定的意味，因为在许多圈子中，对待民主革命的态度是有所保留的，甚至是完全警惕的。对于保守派而言，这种自上而下的变革充斥着“红色”实践的气味，而德田球一对“解放军”的热情拥抱，更加助长了这种疑虑。更为敏锐警觉的评论者们，多赞同河上彻太郎一针见血的讽刺说法。这位超然的文学家在 1945 年 10 月将美国的政策描述为“配给制的自由”。他的巧妙表达切中要害：

这是加藤表现早期占领军政策带来自由的众多画作中的一幅。巨大的美国剪刀剪断了束缚“人民”的锁链，而背景中，保守势力的掮客和军国主义分子正在逃跑。这是特指 1945 年 10 月 4 日，盟军最高司令部的《人权指令》。

由法令授权的民主，本身就具有内在矛盾，而在无条件投降的历史语境中弘扬自由更具有反讽意味。“配给制自由”的错位表达效果，在于它使日本人领悟到，他们正在美国人的统治下，继续经历着曾在战时所经历的配给制。[6]

就连加藤悦郎的欢呼，也包含一丝警戒的意味。他那小小漫画集的持久魅力正在于，他对民主革命理想的热情中掺杂着忧虑：这个“礼物”并非是日本人自己挣得的。例如，那幅美国巨剪漫画的说明是：“锁链被剪断了——但我们务必不要忘记，我们没有流一滴血、一滴汗来剪断锁链。”他的最后一幅漫画，画的是一个人懒散地躺在堆满礼物的屋子里。漫画的说明警告：“我们日本人看来已经习惯了享受革命成果的甜蜜，而且极端不想为这珍贵礼物变成我们自身的成果费一点力气。” 71

随着时间的推移，有不少评论家对自上而下的民主革命概念本身所蕴含的被动性和肤浅性给予关注。他们认为，正如战争期间普通民众被军国主义者和极端民族主义者所操纵利用，民众现在只不过是在追随另一套新的领导班子而已。剧作家和评论家山崎正和，1948 年从“满洲”归来时，还是一个中学三年级的学生。他后来回忆起对“所有的一切都是赠与的”深刻印象。民主在这样的背景下来得“太容易”，从而无法真正在本土扎根。另有一些人洞察到，自上而下的民主助长了令人遗憾的“不负责任的逻辑”，每个人都学会了对上级的指示唯唯诺诺。[7]

1949 年末，这种感到民主革命有问题的认识，由民主革命最热心的支持者之一南原繁传播开来。南原是东京大学的校长，也是一位基督教徒。作为第一位被允许离开自己被占领的祖国的日本人，南原在华盛顿发表了讲话。他将第二次世界大战概括为一场“精神对精神”、“人民对人民”的战争，而这场战争暴露出了他的同胞们的严重缺点。南原信奉欧洲文艺复兴的理想，将之作为确立个人人格与自由探求真理的基础。他断言，他的国家现在也不得不经历“自身的复兴”。南原回顾了十九世纪中期向西方敞开大门之后的明治维新，这一早期的改革时代，只是创造了一个现代国家的“外观”。它只是强调建设国家的实力和扩展国家的财富。人文主义精神，至多也不过是从属于这些目的。尽管现在“纠正这些错误还为时未晚”，但是现在就为一个民主的新日本欢呼显然

72

占领军提供的最单纯、最有效果的“从天而降的礼物”，通常是糖果、雪茄和口香糖，以及随时随地的友善态度。在第一批美国大兵到达后的数天之内，“给我巧克力”已经成了向占领者们围拢来的孩子们的口头禅。上面的照片是1945年9月，学童们蜂拥着一名在吉普车上发放糖果的美军士兵。

还为时过早。南原评论说，“不像是在美国，政治民主在日本还未获得真正的生命”。反动势力反攻倒算的可能性也绝非没有可能。[8]

占领结束后，批评家龟井胜一郎，立即在一份日本国内最畅销的月刊上撰文，巧妙地表述了如下观点：被动的革命尽管总比虚伪地做做样子要好一些，但还远不是争取民主的真正奋斗。龟井写道，美国占领日本不是要进行彻底的意识革命，而是要强化“殖民地心态”。因而，回首所取得的民主实绩，甚至远不如加藤悦郎的那本小书所表现的当初的期待和理想。在某些方面，美国对日本的占领，让龟井联想起外面是丝绳、里面却暗藏铁丝的圈套，或是一套好莱坞的电影布景。[9]

占领者们对他们“自上而下的革命”，自然看得更为积极一些。然
73 而在许多方面，即便以他们自认为正义高尚的立场看来，这也是一个理想主义与现实考虑交织、民主主义热情和殖民者心理不期而遇的历史时刻，更不用说那些史无前例的方面了。改革者本身就是殖民地的总督。

借用一句现成的话来形容，他们是多愁善感的帝国主义者。作为因战争胜利而改变了事业轨迹并提升了事业目标的殖民统治者来说，他们具有J. K. 加尔布雷斯（John Kenneth Galbraith）所概括的“目的高贵的傲慢自负”的性格特征。[10]

非军事化与民主化

正式而言，日本从1945年8月到1952年4月受外国控制期间，称为同盟国占领日本时期。这种说法不确切。尽管成立了两个国际咨询委员会以代表战胜国处理占领事宜，但它们的影响几乎可以忽略不计。[11]自始至终，美国单方面决定大政方针，并对有关占领的大事小情发号施令。

因此，是华盛顿的决策者们起草了确立初期占领目标的三个基本文件：《波茨坦宣言》中，由美、英、中三方宣布了投降条款；《日本投降后美国的初期对日方针》8月底被提交麦克阿瑟，9月22日对外公布；还有一个详述日本投降后对日政策的全面的军事指令，也在8月底由参谋长联席会议以草案形式提交给了盟军总司令。尽管前两个文件很快就公布了，但是作为占领军领导人的许多基本行动方针的第三个文件，直到1948年11月才解密。[12]

正像他最高司令官的头衔一样，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对占领事宜的大权独揽，正是美国对政策和权力垄断的缩影。其他盟国不得对麦克阿瑟的权威有所异议。麦克阿瑟属下插手军事和民政事务的庞大占领军，除了象征性的少数例外（如原子弹爆炸后驻扎在广岛周边的英澳联合军队），几乎全是美国兵。此后数年间，拜访麦克阿瑟及其总部的重要使团，都是从华盛顿而来，而且几乎清一色是美国人。这种支配形态并非遮遮掩掩。实际上，在8月底呈交麦克阿瑟、9月份公布的《初期对日方针》文件中，明确规定在同盟国发生分歧的场合，“美国的政策将起决定作用”。

与占领同时进行的顶级战犯审判，一般正式称为远东国际军事审判，也是个具有误导性的名称。审判的确是由各国法官组成的审判团主持，而且审判长是澳大利亚人，但是东京审判实在是一场美国支配下的表演。美国人操纵“国际检察团”为审判设定诉讼程序，而且他们容许

忽视其他国家代表团提出的异议。

三个基本的纲领性文件，以不断加码的方式提出的占领目标，是广泛而野心勃勃的。也就是说，9 月份公布的投降后方针提出的民主化要求，比《波茨坦宣言》当初实际宣布的更为广泛。因而，详述如何将这一公开方针贯彻执行的那份冗长的、秘密的参谋长联席会议指示，直到 11 月份才真正定稿。这份指令明确要求麦克阿瑟和他的总部，对民主化日程进行细致有效的管理。

在这一进展的背后，隐藏着华盛顿官僚政治内部争论和派系斗争的复杂历史。直到战争临近最后时刻，嘲笑“让日本实行民主化”观点的美国国务院保守的日本问题专家才发现，自己被更为开明和进步的改革者们否决了。加藤悦郎画作中空降日本的“民主主义革命”礼物，并非来自那些“处理日本问题的老手们”，而是来自美国陆军部[13] 的一批人，他们是在更为广泛和激进的意识形态基础上，构架亚洲的战争与和平问题的。

《波茨坦宣言》绝非是枯燥乏味的文件。它保障了日本民族作为一个国家不被奴役或是毁灭，尽管他们将失去其帝国。在投降之日，日本国将被置于军事占领之下；“严酷的正义”将给予战争罪犯们以惩罚；那些曾经“欺骗和误导日本人民征服世界”的人的权力和影响将“永远”被消灭；将会严格执行“公正的赔偿”；军事力量将会“完全解除”；日本经济将进行非军事化，但最终将被允许重新进入世界贸易；日本政府将被要求“为复兴和巩固日本人民的民主倾向去除障碍”，并建立言论、宗教和思想的自由以及对基本人权的尊重。当“建立起一个合乎日本国民自由意志的、倾向于和平和负责任的政府”时，占领期将会终结。这最后的一句话，尽管有时被解读为允许保留天皇制的讯号，实际上是有意措辞暧昧不明。毕竟，天皇的臣民们，从未完全自由地表达过自己的观点，在当时也没有选择他们自己的政府体制的权力。

相比于这些严厉而宽大的条款，另外的两份政策文件增加了几项目标，将占领从非军事化和政治改革的温和演习，转变成了史无前例的人为的民主化实验。这些文件明确指示，解除武装和非军事化不仅是“彻底的”，而且是“永久性的”。它们还具体阐述了要对那些鼓吹军国主义或好战的民族主义的人进行清查，其范围将会比《波茨坦宣言》所设想

的更加广泛，甚至将延伸至“经济领域”。

除此之外，这些指导方针还体现了政策制订者们的一个强有力的新兴观念，那就是，占领军领导者应当积极投身于改变日本民众心理的尝试。强调这一自负的目标，是源于一种日益增长的紧迫感：日本不仅应当以“民主化”来阻止军国主义的死灰复燃，同时还要摆脱共产主义影响上升的态势。根据文件规定，这种再教育方针，不仅要通过媒体积极宣传美国的占领目的，而且要“最小限度地制约和审查”新闻出版、广播电影以及个人通信。[14]

这一定稿于波茨坦会议之后的政策蓝图，也将民主化的理想延伸到了经济领域。一方面，它强调占领军当局对“日本的经济复苏或日本经济的强化”不负任何责任。除了制止可能导致混乱的经济危机（例如避

胜利者的紧急粮食援助始于 1946 年，帮助日本缓解了严重的粮食短缺，唤起了许多日本民众表达感激之情。这是在东京郊外举行的庆祝会，恰逢传统的盂兰盆会，欢庆的舞蹈伴随着一年一度迎接亲人亡灵归来的仪式。

免饥荒），美国的方针政策要求让日本自作自受。同时，在《波茨坦宣言》之后明确规定，推进“对收入进行广泛分配和对生产交易资料广泛占有”的政策。为此，华盛顿的决策者们要求“解散掌握日本大部分工商业命脉的产业和金融联合体”。这等于是对自二十世纪初以来就支配日本经济增长的老财团和在日本战争动员过程中出现的“新财阀”，同时进行直接打击。在这一反垄断战役实施前后，最高司令官还受命促进劳工运动以及大规模的土地改革运动。

这是一个野心勃勃的改革议程。通过消除将日本引向战争的军国主义根源，无理无序的日本将被变成一个和平、民主、遵纪守法的国家。在著名的《初期对日方针》的开篇，占领的最终目标被设定如下：

> （1）确保日本不再成为对美国乃至世界的和平与安全的威胁。
>
> （2）促进建立尊重他国主权并支持联合国宪章的理想和原则所反映的美国目的之和平与负责的政府。美国希望此政府应尽可能与民主自治原则相一致，但是向日本强加不受自由表达的国民意志支持的任何政体，并非盟军职责所在。

这种上意下达的彻底改革合法化的关键，就是“自由表达的国民意志”的提出。改革者们所强调的理由是，在日本帝国现行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下，人民不可能自由表达所思所想。让民众真正自由地表达他们的意志，需要彻底废除专制体制，即使这难脱企图向战败者“强加”外来的政治体制的嫌疑。此论证逻辑表明，改革要强行创造一个“人民意志”优先的社会，从而根除使日本成为亚洲苦难根源的“战争意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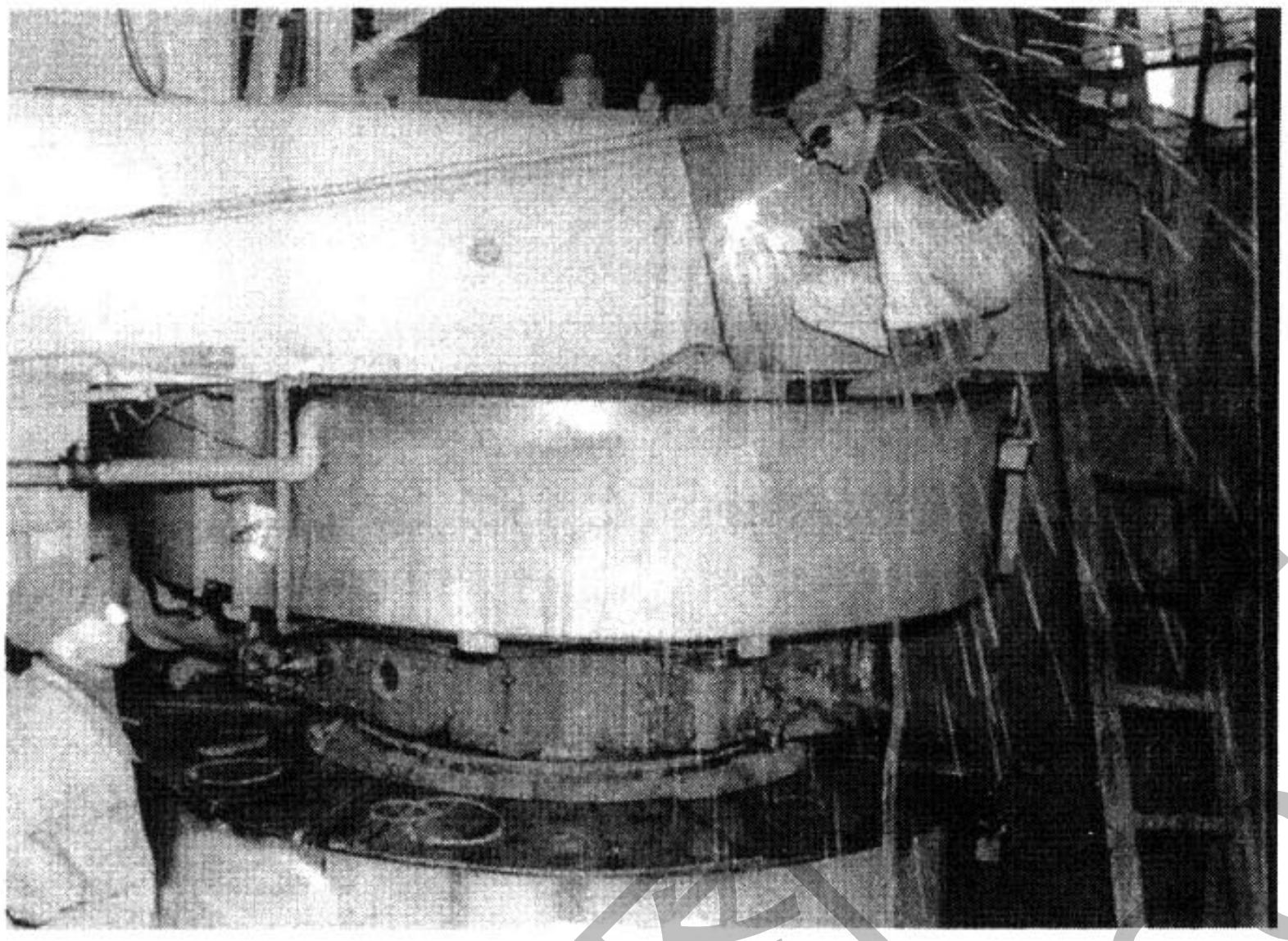
占领开始后不久，美国助理国务卿迪安·艾奇逊（Dean Acheson）曾以生硬的措辞表述此意。他宣布，占领的目的是要确保“改变使日本产生战争意愿的现存经济和社会体系，以使战争意愿不再继续”。[15] 这句别扭冗长而又雄心勃勃的乏味话，其实简洁地传达出了美国人的救世军意识，正如改革者们描述他们的任务时，习惯使用的救世主的简单比喻一样。谈论根除侵略的根源变成了平常事。最高司令部民政局的一位理想主义者和有权势的律师查尔斯·凯德斯（Charles Kades）上校，在指

作为广泛的“非军事化”计划的一部分，占领军销毁了数量庞大的日军武器装备。这幅照片很容易让人误认为是地狱般的战争情景，实际上这是在北九州著名的佐世保基地，美军坦克向五十架日本战斗机喷射凝固汽油和火焰。

出日本领导人提出的温和的投降后改革方案与盟军最高司令部强迫他们采取的激进政策之间的区别时，巧妙地表达了这一看法：“他们想保留一株生病的树而剪掉树枝。我们觉得，为了消除疾病，必须将树连根拔起。不然我们会发现虽然长出新树枝，这棵树还在生同样的病。”[16] 对当时的简洁表述，即盟军最高司令部的任务就是贯彻执行日本的“非军事化和民主化”。

由战争的胜利者承担的这一大胆创新的任务，既没有法律依据，更史无前例。几乎未对这样的一项任务进行任何反省，美国人就开始着手其他占领军队从未做过的事情：重建一个战败国的政治、社会、文化和经济结构，并逐步改变其民众的思维方式。如果说日本人有些不知所措的话，并不使人感到意外。征服者正着手于未知的领域，他们一边摸索前进，一边明确他们的伟大任务。起初，他们自己对于这一任务所要施行的具体改革，也没有一幅清晰的愿景。

在一定程度上，这与占领德国的政策具有可比性。事实上，美国自卷入“二战”以来就奉行的“欧洲优先”政策，使得德国首先投降必不可免，而这意味着对战败的德国所采用的政策，将会作为起草日本投降后方针的指南。虽然如此，差别仍然引人瞩目。当然，最明显的是，日本完全置于美国的控制之下，而德国被分成了美、英、法、苏的占领区。



在销毁“与战争相关的”设施过程中，最臭名昭著的插曲发生于 1945 年 11 月。当时，美国人将东京理化学研究所的回旋加速器用喷灯切割开来，并将残骸抛入了东京湾。全世界科学家们愤怒的呼声，最终迫使来自华盛顿的军事官员们发表了一份致歉声明。

除此之外，日本还屈服于“麦克阿瑟式”的控制，无疑这是一种带
79 有明显个人印记的独特的统治体验。麦克阿瑟和那些聚集在他麾下的改革骨干分子们，表现出一种救世主式的激情，这也是在占领德国时所不具备的。而美国的欧洲中心主义做法，也在战后初期给予了麦克阿瑟的最高司令部以不同寻常的自由。当华盛顿的决策者们集中关注在东欧的对苏政策和西欧重建时，专横的麦克阿瑟一直到 1948 年，都像是一个小小的君主统治着他的远东领地。1951 年，麦克阿瑟在向美国参议院委员会解释他在日本所发挥的权威之时，他指出“我不仅像我们的总统在美国本土那样拥有通常的行政权，而且我还拥有立法权。我可以颁布法令”。[17]

种族和文化因素也使日本变得特殊。与德国不同，这个被击败的敌人对胜利者来说，代表着一种异国情调的、格格不入的社会：非白人、非西方、非基督徒。黄种的、亚洲的、异教徒的日本，慵懒淡漠而又敏感脆弱，唤起了一种在面对德国时不可想象的带有种族优越感的传教士般的激情。当纳粹主义仅被看作是成熟完备的“西方”社会的肿瘤之时，

日本的军国主义和极端民族主义却被当作是封建东方文明彻底腐朽的本 80
质反映。对美国的改革者们而言，这场自上而下的民主改革，其近乎肉欲的兴奋快感，来自于使一个东方的敌人改变本性，将其转变成一个至少近似于他们可接受的、健康的、西化的国家。

通过强调以下理由：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一场史无前例的破坏性灾难，而且任何稳定的新世界秩序都需要打破原有的模式，推行在国际法方面史无前例的占领政策并把日本变成一个“遵纪守法”的西方模式国家的不正常企图被合理化了。胜利者明白无误的救世军气味，混合了高度的敬畏、希望和理想主义，具有一种创建新的国际行为准则的清晰的自觉意识。[18] 对一般公众而言，这种态度在顶级战犯审判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在此过程中，对日、德采取的政策都是建立在同样的新颖独创的法律前提之上。依据纽伦堡审判建立的原则，被逮捕的“甲级”战犯被指控犯有“反和平罪”和“反人道罪”，而这些罪名在国际法中是无先例可循的。东京审判中的荷兰籍法官洛林（B. V. A. Röling），后来承认了审判程序中的“不公正特征”和“重大的谬误”，但是仍然表示确信这些审判对于“人类亟需的法律发展”做出了贡献。用他的话来说，“国际法，还在继续探索如何禁止战争和如何定义战争犯罪行为”。[19] 在日本，与此相似的理想主义、傲慢自大和满怀憧憬，唤起了类似的传教士的使命感，去创造有可能永久根除“战争意愿”的新规则。这一点整体上决定了初期的“非军事化和民主化”政策。

强制性的改革

在这样强烈的意识形态和情绪化的环境中，战败的日本，被种族优越感、功利心以及后来被冷战吞噬殆尽的理想主义精神的大胆实验当成了史无前例的实验对象。这是一项从开始就充满了自相矛盾的计划，包括那个“自上而下的革命”的概念。持久的、有生命力的革命通常来源于下层。当然，它们必须最终来自本土社会内部。从没有真正的民主革命是与军事专政联系在一起的，更遑论新殖民主义的军事专政，完全就 81
是唯麦克阿瑟的马首是瞻。

实际上，所有卷入这场正义的讨伐运动的美国人都清楚这些矛盾所在，但是这并没有使他们气馁。尽管改革者们花费了数月时间才敲定了

他们野心勃勃的计划的全部具体问题，并将此传达给日本政府。日本官员们详细研究了《波茨坦宣言》，起初顽强坚持日本接受投降条款的方式是有条件的投降。在这个关键问题上，日方得到的干脆回答是：日本的投降从来就是而且现在还是无条件的。正如日本媒体忠实而苛刻的报道，日本政府不是占领军当局的对手。[20] 美国人意图的野心之大，最终给全体日本人留下了深刻印象。这就是在东京湾的投降仪式一个多月后，大肆发布的盟军最高司令部的两份指令。

10 月 4 日，最高司令官命令废除政治言论限制。曾经作为逮捕数千名批评政府者（通常是左翼人士）的依据，《一九二五年治安维持法》被废止。政府关于集会和讲演的限制松动了。内务省的特别高等警察组织，即“思想警察”，被取消。内务省和国家警察机构的头目们被解职。从监狱中释放政治犯的命令一出，为在长达 18 年的监禁生涯中坚守节操的德田球一及其数百名共产主义战友重返政治舞台，铺平了道路。在此命令发布之前，东久迩宫内阁明确表示释放共产主义政治犯不可接受。在麦克阿瑟的《人权指令》签署翌日，东久迩宫内阁集体辞职。[21]

一星期后，新任首相币原喜重郎第一次拜会麦克阿瑟并接到了一个简短的命令，与此相比，之前的指令就显得温和多了。除“宪法的自由主义化”而外，日本政府还受命赋予妇女选举权，促进劳工运动和教育自由化，通过改变“产业垄断控制”实行经济民主化，总之，消除日本社会一切的专制统治残余。突然之间，推行民主的抽象宣言，变得分外清晰具体。

支持者和批评者都将 10 月 11 日的指令，看作是美国承诺的真正激进的“民主化”进程的信号，而在随后的几个月中，事实证明他们是对的。自 11 月初开始，盟军最高司令部发起了向巨大的财阀集团的正面进攻，开始强行解散财阀家族藉以控制他们庞大帝国的“持株会社”。最终，“反垄断”和“排除集中”立法获准通过，数百个大会社成了指定的分割对象。几乎与此同时，一项农业土地改革开始了，将在数年内彻底剥夺农村地主阶级的特权，破坏农民广泛受地主剥削的制度，取而代之的是大量拥有小块土地的自耕农阶层。始于 9 月的逮捕“甲级”战犯嫌疑人的温和进程，在 1945 年终也开始加速。

以天皇为中心的极端民族主义分子的大本营、受日本政府庇护的国

教神道教，在12月15日与国家政权分离。12月22日，在盟军最高司令部的压力下，日本国会和议会通过了保障劳动者集会权、罢工权、团体交涉权的工会法。在同一个月，杜鲁门总统的战争赔偿特使埃德温·泡利（Edwin Pauley），主张从日本早已深受打击的工厂取走大规模的现货进行赔偿。对于保守派来说，1946年的新年带来了更多不祥的消息，包括一系列清查令的开始，将最终禁止大约20万人再担任公职，其中绝大部分是前军事官员。

而这只是这场自上而下革命的开始。在其后的两年间，改革扩展到民法和刑法改革，废除使男尊女卑合法化的“封建”家族制度，赋予妇女参政权，警察分权化，制定保障工作条件的进步法令，改善教育体制和课程设置，革新选举制度，以及促进针对中央政权的地方自治。民主革命最大胆和不朽的行动，则是推动日本政府出台新宪法。新宪法保留了天皇制，但是同时确立了国民主权的原理，保障广泛的人权。在此宪章精神之下，天皇往昔的臣民成为了现代意义的国民。

新的国民宪章，1946年2月由盟军最高司令部提案，9个月后颁布。宪法经过了公众和国会广泛深入的讨论，堪称此次改革计划皇冠上的明

83

1946年大选首次施行女性投票。一些妇女还身穿战时常见的雪裤。女性选举权的获准，有时被称作“从麦克阿瑟那儿得到的投票纸”。

珠。它不仅将“民主主义化”的基本理念规定成文，而且通过明确禁止日本以武力解决国际争端，与“非军事化”的原则完美结合起来。日本帝国的陆海军已经解散，军事组织已经废止。在新宪法序言和宪法第九条之“放弃战争”的规定下，日本的和平主义进程正式启动。这是一个极好的创举，由麦克阿瑟发动制定，同时与占领军基本方针确立的目标完全一致。

这些激进的政策，震惊了战争结束时大权在握的日本各界精英。假使由自天皇而下的权势人物们自己制定改革计划，他们绝对想不到要发动如此激烈的变革。而且假使在战争最终阶段占领军真的向日本政府让步，同意“有条件”投降的话，那么现在日本政府很可能已经将美国改革者成功拦截。对保守派来说，战败时期最首要的任务是避免社会动乱，维持以天皇为中心的“国体”不变，并尽可能使国家经济恢复元气。他们拒绝一切有关军国主义、政治压制、军事侵略等“根本性”原因的讨论，而选择将近期的战争描绘成由帝国军队内部一小撮不负责任的阴谋分子带来的失常行为。他们继续争辩说，这就是原因，不需要彻底的结构和制度改革。相反，所需要做的一切，就是将国家和社会恢复到1920年代军国主义分子掌权之前的原状。依靠他们自己的力量，这些文职领导人可能会在战后对军部领导者采取温和的清查行动，或是进行几项小的改革，旨在防止将来极端军事行为的发生。[22]

日本内阁成员公开为被迫执行的严酷改革悲叹垂泪，因无力阻止神圣的“传统”被破坏而心烦意乱。少数保守派领袖，如担任1946年到1947年、1948年到1952年日本首相的吉田茂，甚至向征服者们直率地表达了对日本民主化可能性的轻视。吉田是典型的精英统治论者，他认为日本人民不胜任真正的自治，而凡是不承认这一点的人，要么是受民族优越感之蒙蔽，要么是被左翼宣传所催眠。显然，吉田和他的同僚们，被加藤悦郎描绘的举国热烈拥抱美国人“天降的礼物”的壮观场面吓坏了。

这是一个不同寻常的历史时刻，而且是一个不同寻常地充满变化的历史时刻，前无古人，而且事实证明，也后无来者。像加藤悦郎一样，许多日本人真心欢迎这场自上而下的革命。它燃起了他们的希望，照亮了他们的梦想。美国式民主，以允诺空前的个人自由与超出预期的民意

表达的方式，打开了日本社会独裁体制的缺口。

加藤担忧，战败的疲弊、保守派的反弹和“自上而下”的革命概念本身存在的民众斗争的缺失，有可能会妨碍日本将民主革命变为自己的东西。在这一点上，他的担忧与吉田茂的期待产生了共鸣。没有人真正知道，未来将会如何。

注释：

1 这次交锋是由 Kades 在与竹前荣治的一次冗长的会谈中提及的，见载于“Kades Memoir on Occupation of Japan”一文（《东京经济大学论丛》148 号，1986 年 11 月），p. 306。这几乎成了美国改革者与他们众多的批评者和怀疑者之间仪式性的交锋。另一例证参见 B. V. A. Röling, *The Tokyo Trial and Beyond: Reflections of a Peacemonger*, Antonio Cassese 编（Cambridge: Polity Press, in association with Blackwell Publishers, 1993), p. 83。

2 加藤悦郎《赠与的革命》曾收录于ラッキー文库系列丛书（东京：コバルト社刊，1946 年 11 月）。衷心感谢 Hisayo Murakami 提醒我在美国马里兰大学 McKeldin 图书馆的 Gordon Prange collection 占领期文献中，注意到这套现已十分罕见的丛书副本。若想查找加藤 1942 年招贴画的复制品，请参见 John W. Dower, “Race, Language, and War in Two Cultures: World War II in Asia”一文，载 Lewis A. Erenberg 与 Susan E. Hirsch 编，*The War in American Culture: Society and Consciousness during World War II*（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6), p. 195。加藤战时画作的一个精选洁本，被收入《加藤悦郎漫画集》（东京：加藤悦郎漫画集刊行会，1960)。

3 有关这些“上帝之手”的美国漫画的实例，可参见 John W. Dower, *Japan in War and Peace: Selected Essays*（New York: The New Press, 1993), p. 289。Harry Emerson Wilds，一位占领事件的亲身参与者，将他的著作 *Typhoon in Tokyo: The Occupation and Its Aftermath*（New York: Macmillan, 1954）中的一章，题名为《自上而下的革命》。Justin Williams，作为当时对美国国会政策的监督者，将他的回忆录命名为 *Japan's Political Revolution under MacArthur: A Participant's Account*（Athens: University of Georgia Press, 1979)。

4 Junnosuke Masumi, *Postwar Politics in Japan, 1945 – 1951*, Japan Research Monograph 6（Berkeley: Center for Japanese Studies, Institute of East Asi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1985), pp. 88 – 89.

5 这些日本词汇是：贈り物、プレゼント（礼物），ポツダム革命（波茨坦革命），天下りの改革（自上而下的改革)。可参见久山康编《战后日本精神史》（东京：创文社，1961)，p. 7；平凡社编集部编《昭和世相史　ドキュメント　战后篇》（东京：平凡社，1976)，p. 8（此文献下引为 *SSS*)。

6 河上徹太郎“配给制自由”的讽刺说法，激起了许多自由主义者和左翼人士的批判，可参见 *SSS*，p. 8；日高六郎，《战后思想の出发》，《战后日本思想大系》第一

卷（东京：筑摩书房，1960），pp. 76 – 79；丸山真男，《后卫の位置から——〈现代政治の思想と行动〉追补》（东京：未来社，1982），p. 114。

7 山崎正和、黑井千次，《わが战后体验》，《战后体验》（《人生读本》特别号，东京：河出书房新社，1981），pp. 247，255。关于不负责任的逻辑，参见久山康《战后日本精神史》中 1960 年隅谷三喜男、猪木正道、西谷启治等人的讨论，pp. 91 – 96。

8 南原繁，《南原繁著作集》，第七卷（东京：岩波书店，1973），pp. 299 – 317；南原的醒悟以及其后的思想发展，体现在同一著作 1957 年的初版本序言中，pp. 5 – 10。

9 亀井胜一郎，《敗战のつらさ》，《〈文艺春秋〉に见る昭和史》（东京：文艺春秋，1988），第二卷，pp. 202 – 206。这篇文章最初发表于 1952 年 5 月。

10 可参见 Robert Wolfe 编，*Americans As Proconsuls: United States Military Government in Germany and Japan, 1944 – 1952*（Carbondale: Sou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Press, 1984），又见 James C. Thomson, Jr., Peter W. Stanley 与 John Curtis Perry 编，*Sentimental Imperialists: The American Experience in East Asia*（New York: Harper & Row, 1981）。Galbraith 的说法，尤其是指那些通常年轻的经济计划担当官（包括他本人在内），他们掌管着战时美国经济的运营。参见 Galbraith, *Journey Through Economic Time: A Firsthand View*（Boston: Houghton Mifflin, 1994），p. 118。

11 与占领事宜相关的两个基本的国际组织，一是 11 国组成的“远东委员会”，设于华盛顿特区；一是美国、澳大利亚、中国和苏联 4 国的“对日理事会”，设于东京。参见 *Activities of the Far Eastern Commission: Report by the Secretary-General, February 26, 1946-July 10, 1947*，美国国务院报告 2888 号，远东系列之 24，1947；*The Far Eastern Commission: Second Report by the Secretary-General, July 10, 1947-December 23, 1948*，美国国务院报告 3420 号，远东系列之 29，1948；*The Far Eastern Commission: Third Report by the Secretary-General, December 24, 1948-June 30, 1950*，美国国务院报告 3925 号，远东系列之 35，1950；以及 George Blakeslee 出色的综合报告，*The Far Eastern Commission: A Study in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1945 – 1952*，美国国务院报告 5138 号，远东系列之 60，1953。“对日理事会”的 4 国会晤，往往演化为冷战辩论术的交锋，尽管杰出的澳大利亚代表决不轻易屈从美国的意志；参见 W. Macmahon Ball 的亲历记：*Japan: Enemy or Ally?*（New York: John Day, 1949）。

12 这些文件见载于各种出版物，包括占领期前三年基本的官方文献：Supreme Commander Allied Powers, Government Section, *Political Reorientation of Japan, September 1945 to September 1948*, volume 2（Washington, D. C.: U. 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49），pp. 413，423 – 439。关于麦克阿瑟到底何时接到初期基本方针草案的问题，参见 Marlene Mayo，“American Wartime Planning for Occupied Japan: The Role of the Experts”一文，见前引之 Wolfe，pp. 4，47，468 – 472（注 93，97，99）。至于参谋长联席会议的秘密指令（被称为 JCS 1380/15），对东京盟军最高司令部的重大意义，参见 Theodore Cohen, *Remaking Japan: The American Occupation as New Deal*（New York: Free Press, 1987），pp. 4，10 – 13。Edwin M. Martin 所著 *The Allied Occupation of Japan*（New York: American 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 1948），注意到了这一指令直至 1948 年 11 月才解密的事实，p. xi；

此书出自美国国务院官员之手，反映了美国官方的立场，并将参谋长联席会议指令全文 JCS 1380/15 作为附录。

13 Wolfe 书中 Mayo 引证详实的文章（pp. 3 – 51，447 – 472），对这一点有精彩论述。亦可参见 Cohen，pp. 3 – 48；以及 Akira Iriye，*Power and Culture：The Japanese-American War，1941 – 1945*（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1）。

14 Mayo，pp. 41，48.

15 Dean Acheson，*Present at the Creation：My Years in the State Department*（New York：Norton，1969），p. 126.

16 参见前引之 Kates 与竹前荣治的会谈，pp. 289 – 290。

17 麦克阿瑟在参议院听证会上的证言，刊登于 1951 年 5 月 4 日的《纽约时报》。

18 当面对美国作者的大量报道，例如，与“二战”中日本的占领政策以及战后苏联在东欧的政策相对照，将占领日本作为美国根本的理想主义与慷慨大度的典型例证时，我们必须谨记日本被占领的特殊性。在军事安全考虑优先的形势下，美国并未在朝鲜半岛南部和冲绳认真贯彻改革主义的占领方针。日本正好幸运地被排除在了战后这种高于一切的冷战安全思维之外。

19 B. V. A. Röling，“The Tokyo Trial and the Quest for Peace”，收入 C. Hosoya，N. Ando，Y. Ōnuma 及 R. Minear 编，*The Tokyo War Crimes Trial：An International Symposium*（Tokyo：Kodansha International，1986），p. 130。

20 《朝日新闻》，1945 年 9 月 17 日。

21 10 月 1 日，以治安维持法名义被起诉的大约 3000 人获释。其中约 800 人（绝大多数是共产主义者）曾入狱，其他人曾被软禁或处以其他方式的拘禁。Joe Moore，*Japanese Workers and the Struggle for Power，1945 – 1947*（Madison：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1983），p. 14。关于日本政府反对释放政治犯的情形，参见 Masumi 前引书，p. 44。

22 占领军登陆之前，吉田茂曾经简洁地表述过这一观点；参见他在 8 月 27 日的简报，引自猪木正道《评传吉田茂》，第三卷（东京：读卖新闻社，1978 – 1981），p. 61。

抗日战争图书馆 www.krzzjn.com